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赵月枝 吕新雨 | 主编

Herbert Schiller

信息资本主义
时代的批判宣言
赫伯特·席勒思想评传

〔美〕迈克斯韦尔（Richard Maxwell）著

张志华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赵月枝 吕新雨 | 主编

信息资本主义 时代的批判宣言：

赫伯特·席勒思想评传

[美] 迈克斯韦尔 (Richard Maxwell) 著
张志华 译

Herbert
Schiller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赫伯特·席勒思想评传/(美)迈克斯韦尔著;
张志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675-3635-7

I. ①信… II. ①迈…②张… III. ①席勒(1919~2000)—传记
IV. ①K837.1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3164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HERBERT SCHILLER (Critical Media Studies: Institutions, Politics, and Culture)

By Richard Maxwell

Copyright © 2003 b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合同登记 图字:09-2014-252号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赫伯特·席勒思想评传

主 编 赵月枝 吕新雨
著 者 (美)迈克斯韦尔
译 者 张志华
责任编辑 徐 平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c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3635-7/G·8354
定 价 38.00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赫伯特·席勒在纸老虎电视
(Paper Tiger Television)
读报节目拍摄现场

“批判传播学”编委

丛书总顾问：童兵

丛书编委（排名不分先后，以中文首字笔划为序）：

丹·席勒（Dan Schiller，美国）

冯建三

吉列尔莫·马斯特里尼（Guillermo Mastrini，阿根廷）

孙皖宁（澳大利亚）

邱林川

林春（英国）

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美国）

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英国）

胡正荣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英国）

特里斯当·马特拉（Tristan Mattelart，法国）

斯拉夫科·斯普里查（Slavko Splichal，斯洛文尼亚）

童世骏

葆拉·查克拉瓦蒂（Paula Chakravartty，美国）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资助

总 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发展的转折点,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等方面的危机不断加深。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全世界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都面临挑战。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想象与信念,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消亡,反而在这些新的问题与危机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生机。马克思的“幽灵”在世界各地正以不同的方式复活。

与此相联系,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体系与制度,一方面作为技术基础和经济部门,一方面作为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和民主社会的基础,也面临着深刻的转型,而转型中的巨大困惑和危机也越来越多地激发人们的思考。一系列历史与现实中的问题亟需从理论上做出清理与反思。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理论资源的批判传播研究在长期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中,一直坚持不懈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传播学的发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促进传播制度朝向更平等、公正的方向转型,并为传播学理论的多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时代迫切要求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汇聚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各种力量、视角与方法,探索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批判理论的新路,对当代社会的危机与问题做出及时而有效的回应。

由于中国问题和传播问题是讨论全球化危机与出路两个重要领域,中国传播学界具有担当起自己历史责任的义务和条件。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

史地位，在全球视野中整理、理解与反思这一理论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这一历史传统的更新与发展，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个全球视野不仅面对西方，同时更向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开放，并希冀在不同的比较维度与视野中，重新确立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近一个世纪前，在1929—1930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后的欧洲，在法西斯主义屠杀共产党人、扼杀左派思想的腥风血雨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用大写的“批判”一词代指“马克思主义”，在他们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此后，“批判”一词，因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内核，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以追求人类解放和挑战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为价值诉求的学术取向的代名词。今天，我们不愿也无需遮掩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把本书系定名为“批判传播学”，除了出于文字的简洁性考虑之外，更是为了突出我们的批判立场，强调我们弘扬以挑战不平等社会关系为价值诉求的传播学术的主旨。当然，批判的前提与归宿是建设，批判学术本身即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建设性理论实践。在此，我们对传播的定义较为宽泛，包括任何涉及符号使用的人类意义分享实践以及这些实践所依托的传播技术和知识基础。

本书系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道路，重新检讨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前提的观念、范畴与知识谱系，反思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在历史和当代语境下中国化的成就与问题，探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传播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丰富、发展和挑战，分析当下的经济危机与全球媒体、信息与文化产业的状况和相关法规、政策，以及全球、区域与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我们尤其关注当代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播定位和文化自觉问题以及发展中国的信息社会现状，社会正义与批判的生态学视野下的信息技术与社会发展，文化传播、信息产业与阶级、种族、民族、性别以及城乡分野的互构关系，阶级意识、文化领导权的国际和国内维度，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动态历史关系、文化传播权利与全球正义等议题。我们还将挑战横亘于“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现实”、以及“批判传播”与“应用传播”间的简单二元对立，不但从批判的角度检视与质询那

些维系与强化不平等社会关系的传播观念与实践,而且致力于促进与发展那些挑战和变革现有不平等社会传播关系的传播政策、观念与实践,并进而开拓批判视野下的组织传播、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等应用传播领域的研究。最后,我们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方法论发展与经验研究的批判性运用,探讨文化研究如何在当下传播情境中更新其批判活力,关注媒介教育、文化赋权和社区与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大众传媒与网络时代的大学、学术与跨国知识流通如何强化或挑战统治性知识权力关系等问题。

本书系包括“批判传播学译丛”、“批判传播学文论”和“批判传播实践”三个系列。“译丛”系列译介国外批判传播研究经典文献和最新成果;“文论”系列以专著、讲义、论文集、工作坊报告等形式展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研究的前沿;“实践”系列侧重传播实践的译作和中国经验,包括有关中外传播实践和劳动过程的实证研究、卓有成就的中外传播实践者有关自己的传播劳动和传播对象的反思性与传记性著作、以及富有批判性的优秀新闻作品。

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ECNU-Cornell Center for Comparative Humanities)和2013年7月成立于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是这套书系依托的两家专业机构,并得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支持。宗旨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和跨文化全球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推动中国传播学术的创新和批判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尤其是新一代批判传播学人的成长。

在西方,面对信息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马克思回来了”已然成了当下批判传播学界的新发现、新课题和新动力。在中国,在这片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初就被一代思想家和革命家所反复思考、探索与实践的古老土地上,我们愿以这套书系为平台,为发展既有世界视野又有中国学术主体性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需要对过去一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与实践做出深刻反思,需要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与实践前沿建立有机的联系,需要在克服媒介中心主义的努力中与国内外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产生良性互动,更需要与各种不同的传播研究学派、观点进行真诚对话,彼此砥砺,以共同

加强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推动以平等与民主为目标的中国社会发展，促进以和平与公正为诉求的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建立。

是所望焉。

献给卢克(Luke)

目 录

中译本序(赵月枝).....	1
中文版序(理查德·迈克斯韦尔).....	5
序.....	8
致谢	14
绪言:阅读席勒.....	16
第一章 成为美利坚帝国的批评者	25
第二章 军事—工业—传播—娱乐联合体	49
第三章 思想管理与信息劳工的形成	64
第四章 文化帝国主义与本国传播—文化政策之局限	85
第五章 “信息时代”的骗局与矛盾.....	111
第六章 被收编的文化.....	130
结语:什么样的社会?	146
赫伯特·席勒出版物(1955—2000年)	170
译后记.....	184

中译本序

赵月枝

能为这部书写序,我非常高兴。实际上,我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重要的话可以为这部本来已经十分引人入胜的著作增彩添色,而是因为我把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当作是让别人替我完成了一桩多年前我自己未能完成、而且也早就不可能完成的心愿:让赫伯特·席勒访问中国。

我有幸在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读书和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期间,先后有机会结识北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先驱——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斯迈思由于冷战压迫离开美国,回加拿大任教,并于20世纪70年代初和20世纪70年代末两度到中国做研究,在自己的著作中就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思考。而生活在美国的赫伯特·席勒,虽然应邀到台湾地区讲过学,但在有生之年没有机会访问中国大陆。中美建交和中国改革开放前,他几乎不可能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中国传播学界前呼后拥接纳来访的美国传播学者是他的论敌——反共先锋施拉姆。斯迈思在20世纪70年代对中国的访问作为中国主流传播学的“史前史”被遗忘和边缘化了,施拉姆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访华则是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中被大书特书的历史性事件,而赫伯特·席勒,这位美利坚帝国的批判者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先驱,始终没有到中国大陆访学的机会。除了个人的偶然因素,从某种角度讲,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

赫伯特·席勒的理论兴趣与斯迈思的有所不同,他在自己的论著中

没有太多涉及中国。但是，作为一名具有国际主义情怀的批判传播学者，席勒对中国应该说也是一直有兴趣的。这不仅仅体现在他与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有关中国的各种讨论中，而且体现在他的剪报档案中。赫伯特·席勒辞世后，他的儿子丹·席勒在整理他的学术资料时，发现了一张已经发黄的 1977 年《纽约时报》的整版剪报，那是可口可乐用有关中国的冷战式刻板印象为自己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做的广告。丹·席勒问我要不要这份剪报，我如获至宝般地接受了，并把它当作自己在北美的剪报集锦的开篇之作。后来，这张剪报，连同其他类似的几张被我装裱起来，成了办公室墙上的装饰。

记得在 1998 年初的一次谈话中，当我问及赫伯特·席勒有无访问中国的心愿时，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也答应帮他牵线搭桥。但是，在当时，一方面，我自己在中国国内的学术联系有限；另一方面，由于他总是那么精神矍铄，以至于我没有考虑到他实际上已年迈这一事实，所以没有及时行动。没想到，2000 年初，他就与世长辞了。这成了我的遗憾。

今天，我们拥抱过作为“冷战社会科学”的美国主流传播学，我们当过了施拉姆的好学生，把大众传播当作促进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和宣扬可口可乐所代表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工具，我们终于使中国在“中美国”的构架内成了经济上的“二号”大国。而且，中国赶超赫伯特·席勒所生活过和批判过的“头号国家”——美国——的目标好像也已经可望和可及。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再来系统地、不先入为主地、不带反共偏见地引介赫伯特·席勒的学术思想，可以说是正逢其时。如果说当年中国传播学界拥抱施拉姆包含着某种历史必然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系统研究与发展赫伯特·席勒和他所参与开拓的批判传播学，更体现了历史辩证法演绎的必然逻辑。

尽管中国在牺牲底层民众福利和环境，以便在“中美国”的经济结构内为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及其对外战争机器买单，而美国主导势力却继续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并通过所谓的“重返亚太”战略和扶持各种中外依附性势力企图遏制中国，甚至“扳倒中国”，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所谓的“中国问题”。赫伯特·席勒的学术思想有助于我们认识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竞争对手的美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逻辑。

然而,赫伯特·席勒的学术思想对今天的中国还有更重要的警示意义。当下,中国正在举国上下做“中国梦”。这其中,不乏有人对官方有关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宣称不是心怀敌意就是不以为然,情愿中国继续在“中美国”的世界秩序中通过利益输送和牺牲底层民众利益来结美国统治阶级之欢心,更有人妄想把这个梦做成中国取美国而代之,成为下一个世界霸主的“大国梦”。在这样的语境下,席勒对美帝国从内到外的鞭辟入里的批判,就为我们提供了一副非常及时的清醒剂;这样对外实行强权和对内制造不平等的“头号国家”,中国模仿不了,也不应该模仿。

值得高兴的是,在过去几年中,已有两家国内出版社联系过我,希望我出面主编赫伯特·席勒著作中译本丛书。我也积极响应,多次与席勒家人联系版权事宜。可惜,事情没有我想像的简单。当年,赫伯特·席勒就《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在美国找正式出版社困难重重;后来,他的大部分著作的出版事宜委托给了一位出版代理。这些著作的版权归属问题现在也没有厘清,而年迈的席勒夫人既无力也不愿顾及此事。因此,出版赫伯特·席勒著作中译本丛书的计划至今未能实现。可以说,正是席勒一生所批判知识的商品化和私有化的问题,成了广泛地在中国翻译出版他原著的主要障碍。

这样,翻译出版这部由赫伯特·席勒的学生、纽约城市大学知名教授、北美批判传播学新锐学者理查德·迈克斯韦尔所倾心写成的赫伯特·席勒学术评传就更及时、更重要和更迫切了。迈克斯韦尔是当年听过赫伯特·席勒课程的本科生,而不是我们理所当然想像的他的博士毕业生。但有机会邀请过赫伯特·席勒给我的本科生课堂做客座演讲并体验他那充满激情、智慧和学术火花的讲课,我可以想像,他当年是如何吸引了年轻的迈克斯韦尔,并使后者走上了批判传播这一充满挑战的学术道路的。在这部著作里,迈克斯韦尔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和赫伯特·席勒般的深刻学术洞见,分析了他的启蒙导师的学术历程和学术思想。其中最精彩和对中国有志于批判学术的年轻学者最有启发意义的部分之一,当是他对赫伯特·席勒著作中隐含的批判学术方法论的总结、概括、提炼和阐发。我相信,正是对这种方法论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使迈克斯韦尔本人成为当下美国批判传播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在这部著作面前，我没有必要讨论赫伯特·席勒的学术思想，但我还是希望结合自己对他的认知略说一二。第一，他在冷战语境下追求批判学术的勇气和他的思想在传播学领域的开创性的意义。也正是出于这一考量，我们决定将这部书的书名定为《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赫伯特·席勒思想评传》。正是他那声如洪钟的基调性音符和见山开路的标杆性立场，使后人能在他所拓宽的学术地带从事更细腻和更深入的批判学术工作。第二，席勒作为一位生活在美国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坚持和执着。为了在冷战语境中生存，他曾不得不用笔名发表有关同情和支持劳工的文章；因为他的批判立场，他在大学里受到挤压和各种不公正对待；也因为他的异见挑战了主导意识形态和别人的学术话语霸权，他一直被污名化。然而，他一如既往，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和得到极少研究资助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工作，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直到他去世前的几天，当我去看望他，给他读完报上的一篇文章后，他还不让护士把那份报纸收走，好像他还没有完成剪报一样！

我十分感谢本书的译者、中国传媒大学的同事兼博士生张志华。他在职读博，还被任命为我在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职位的工作助手，并自学法语和西班牙语，工作和学习任务非常繁重。但是，当我问他有无兴趣翻译此书时，他欣然同意了。我更高兴的是，经我推荐，志华有机会到纽约，师从迈克斯韦尔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从而能当面与迈克斯韦尔商榷翻译中碰到的问题。我看过志华的部分译稿，发现他不仅文笔优美，而且工作十分细致，对一些内容的翻译反复推敲。我为有志华这样的能把翻译当作重要的学术奠基工作的年轻学者而感到欣慰。

这本书是一则有关一名美国批判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和学术思想的故事，它更是一则有关批判传播学术的代际薪传和中美间承传的故事。我为自己有缘认识本书的主人翁、本书的作者和本书的译者而感到荣幸，我更能为把此书作为本书系中的第一部译著推荐给读者而感到高兴。

是为序。

2014年6月29—30日

温哥华—北京航班上

中文版序

理查德·迈克斯韦尔

写完《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赫伯特·席勒思想评传》已经十年有余了。从那时候起，席勒教授在研究中所指出的世界传媒趋势或多或少沿着他所描绘的路线在继续前行。

体系性的困境和政治上的不负责任与政府的意愿以及审计的贪腐相应和着，听任一个虚无缥缈的金融业将世界经济拖入萎靡不振的漩涡之中。世界人口中最富的那百分之一继续心安理得地获取利益。

老道的政客们以及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新兴的狂热右翼势力对经济危机推波助澜。经由政治敲诈与宣传的双管齐下而搭起的一个构思拙劣的紧缩模式——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据说理性的经济专家的助力，他们窃走了工人阶级 60 年来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针对世界贫困人口发起的阶级斗争也摧毁了大片消费与文化的基础设施，后者原本对文化、信息、教育与娱乐资源提供了广泛的——如果并不总是轻而易举的话——接触。

甚至当媒体的数量和种类增多的时候信息不平等却加剧了。图书馆被关了；对调查性新闻报道的投资持续流出，并流向了半文盲的评论专家；公立学校进一步的资助被拒绝给予，进而影响到研究和启智的所有领域；整个国家被迫进入一种结构性的贫困状态，这将需要几十年时间予以弥补。

在整个危机期间，媒体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其无力帮助公民理解所发生的一切，而所谓的财经新闻报道完全没能及时就形势发出警报以减